

引言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我国东北部 隔着东海和黄海 有一个和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这是一个由四个大岛及数千个小岛组成的国家。这群岛屿的面积约有 37 万平方公里 其中本州岛、四国岛、九州岛及北海道岛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六。生活在日本的居民主要为大和族。

日本是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 又是一个人口密度大、自然灾害多的国家。生存空间的狭窄和生活条件的艰苦，造就了大和民族坚韧顽强、吃苦耐劳和向外开拓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一旦被统治者煽动、利用，在有条件和时机时，则极易转化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主义。

19 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一样，也都是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

西方列强的侵略 导致了日本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 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下层武士结成联盟，发动政变，废除了幕府制度，拥戴睦仁天皇成立了天皇政府。

1868 年 睦仁天皇改年号为“明治”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时期。在天皇政府的积极扶植下 以“富国强兵”为号召，日本的资本主义通过对内剥削和对外掠夺，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发展。

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虽然地主、资本家及政府都积累了大量财富，工农大众却因遭受沉重剥削而贫困不堪，购买力极低，

致使国内市场狭窄，急需向海外寻找市场。由于资源贫乏、耕地不足，日本的工业原料大量依靠国外进口。但因资本主义起步晚，生产技术落后，既缺乏进口原材料的资金，产品质量一时又无法与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日本只有通过武力来弥补其经济上的缺陷。

历史的沉积和明治时期的社会现状，使日本资本主义带有明显的封建性和军事性，并决定了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扩张性，也决定了它一旦摆脱了列强的宰割，便开始宰割邻边国家。

中国和朝鲜与日本一水之隔。当时的中国清政府和朝鲜李氏政权正内外交困、日趋衰败，因而成了日本对外侵略与掠夺的首要目标。

1871年11月，历来为中国附属国的琉球，有船民遇飓风漂至台湾南部海岸，被高山族居民误杀。这在当时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与日本毫无关系。况且，事发之后日本政府没有作出任何表示。但事过三年，到1874年，日本竟将此事捡了起来，以所谓‘琉球船民’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侵略台湾的战争。日本的入侵，遭到台湾高山族和汉族居民及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但清政府迫于英美两国的压力，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使日本在对外侵略的第一次尝试中就尝到了甜头，也刺激了它继续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

1875年，日军进驻并吞并了琉球，改名为冲绳县。同一年，日军军舰炮击朝鲜江华岛，迫使朝鲜政府在1876年与其签订《江华条约》。

1894年，朝鲜发生内乱，国王李熙请求中国清政府派兵援助平乱。日军却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占领汉城，组织亲日政府，然后声称应这个亲日政府的要求，向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发动

袭击，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

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与外交上的妥协，导致了军事上的连续失败。1895年4月以叶赫那拉氏慈禧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为了换得暂时的苟延残喘，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接受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一切条件，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将中华民族推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也大大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

然而，日本对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入侵，却与沙皇俄国在远东的殖民政策发生了矛盾。

沙俄从17世纪开始侵入黑龙江流域到19世纪中叶通过《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占据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约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制定了所谓“黄俄罗斯”计划意欲吞并整个东北。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辽东半岛，使沙俄感到在侵略中国的竞争中落于人后，沙俄于是联合德国和法国，对日本进行干涉。一面鼓动清政府给日本3000万两“赎辽费”，一面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即所谓“三国干涉还辽”。

日本当时的实力不足以和俄、德、法抗衡，只得暂时放弃辽东。但侵占辽东并继而将整个中国及亚洲大陆变为殖民地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抓紧加强军备增强国力以图卷土重来。明治天皇告谕臣下用不着急于得到辽东半岛，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已经了解该地区的地理人情，不久便可在其他地方再次发动战争，到那时取辽东，也不为晚。

此后，日、俄两国便开始了夺取我国东北的新一轮竞争。

1896年沙俄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并利用清政府对日本的疑惧诱迫其签订了《中俄密约》取得了在我国东北修筑铁路以及俄国舰队驶入我国港岸的特权。到1900年沙俄更以保

护铁路为名，出兵占领了我国东北。

沙俄侵华步骤的加快，不但使日本眼红，而且引起西方列强的忌恨。1904年2月，日军在英、美、德各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对停泊在我国旅顺口及朝鲜港口的俄国军舰发起突然袭击，随后在辽东半岛登陆。为了争夺在我国东北和朝鲜的霸权，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无动于衷地宣布保持“中立”。

1905年3月，日军占领奉天（沈阳），5月，日本联合舰队在马海峡全歼沙俄波罗的海舰队，沙俄战败。根据两国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俄国将其在南满即中国东北南部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并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形成了日、俄两国瓜分东北的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机会。日本利用这个机会，出兵我国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又以武力相威胁，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全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沙俄势力从我国东北退出。日本更急于独占整个东北。但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各种限制，迫使日本放慢了侵华步伐，但仍通过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扩大在华势力。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将在东京召开的“大陆会议”，标志着日本侵华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会议的中心议题便是对华政策，制订了《对华政策纲要》。这个《纲要》认定中国的“满蒙”地区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并声称“如果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受到‘侵害’，便要‘断然采取自卫措施’”。田中在给天皇的奏折中，疯狂叫嚣：“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

服中国。‘确定了先占中国‘满蒙’，然后征服整个中国，进而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全球侵略目标。

与此同时，日本军内的法西斯势力迅速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一方面推动日本军方走上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轨道，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日本政界的对内对外政策。

根据“东方会议”制定的侵华政策和关东军的行动计划，日本政府向当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提出了一系列有损于中国东北主权和利益的要求，妄图迫使张作霖宣布东北脱离中国而“自治”。张作霖虽然是由日本关东军扶植起来的军阀，却不甘俯首听命，断然予以拒绝。

既然张作霖已成了日本侵占东北的障碍，就得搬开。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离奉天站1公里处的皇姑屯被日军炸毁，张作霖重伤而亡。日本关东军本想趁乱占领东北，却因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秘密回到奉天，控制了局面而暂且作罢。

面对日本关东军咄咄逼人的侵略气势，初出茅庐的张学良力排众议，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实现了中国南北形式上的统一。

张学良的易帜，是对日本侵略野心的重大打击。但日本的战争机器业已启动，一场蓄谋已久的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军事入侵日益逼近。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将面临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将以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进行一场长达14年之久的气壮山河的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一 “九一八” 沈阳惊变

1931年9月18日。

这是一个本应十分平静的夜晚。秋风萧瑟，明月高悬。北京城内的清代皇宫、东北平原的田园农舍，都沉浸在新月如钩的秋夜之中。

久病初愈的中国东北军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在夫人于凤至和红颜知己赵四小姐的陪同下，此时正在北京前门外的中和剧场看戏，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在这里演出他的拿手好戏《宇宙锋》。

留守沈阳的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日前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已赶往老家锦州小岭子操办丧事去了。

在沈阳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是参谋长荣臻，这两天忙得不可开交。9月17日是他父亲的寿诞，荣公馆前车水马龙，宾客盈门，荣公馆内灯烛辉煌，觥筹交错。宴席从昨日摆到今日，直到傍晚，仍是余兴未消。

驻守沈阳的东北军主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白天在军营处理公务，入夜便回城内私宅住宿。

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夜晚，却暗藏着阵阵杀机，成了中华民族痛心疾首的“国耻日”。

经过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及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的精心策划，关东军岛本大队第三中队在中队长川岛大尉和队副河本中尉的率领下，乘着夜色接近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的所在地文官屯。部队在预定位置散开后，河本带着七八名经过挑选的工兵，携带炸药潜到离北大营约800米的柳条湖铁路边。

河本是岛本大队的爆破专家，他的任务是将这段铁路炸个口子，以便日后栽赃中国军队。干这种事对他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为了保证在爆炸后列车仍能畅通无阻，河本进行了许多次试验，得出了最佳炸药使用量。在他的指挥下，工兵们将带来的 42 个方形炸药包堆放在铁轨交接处。

一切安排停当，河本看看手腕上的夜光表：晚上 10 点 20 分。远处的北大营隐约可见，静寂无声。农历八月的东北秋夜，已有几分寒意，中国士兵大概已经上炕了。河本咬咬牙，点燃了导火线。随着一声巨响，经过柳条湖的南满铁路被炸坏了一小段。

潜伏在附近的川岛中队长听到爆炸声，立即命令士兵向北大营开炮。炮声中，川岛拔出佩刀，指挥士兵们齐声呐喊，冲向北大营。

北大营的中国士兵刚刚入睡，迷迷糊糊中挨了几发炮弹，接着又听到一片呐喊。有些士兵爬起来，向营外张望，却见日本兵持枪冲了上来。这时，整个北大营都惊醒了。士兵们揉着惺忪的睡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川岛见中国军营一片混乱，大喜过望，率部冲入了北大营。这时，中国士兵才清醒过来，先是呼喊，继而四散奔走。在横眉怒目的日本兵刺刀面前，尽是赤手空拳、惊慌失措的大个子东北兵，竟没有人指挥抗击。日本兵刺刀捅挑，机枪扫射，成群手无寸铁的东北兵倒在血泊之中。

9 月 19 日清晨 6 点半，日本人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北大营，继而占领了沈阳城。中国震惊了，世界震惊了，连日本人自己也震惊了。“九一八”这个对中国、对日本、对整个东亚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的夜晚，竟然就这样严酷地载入了史册。

九一八事件发生时，日军在东北的总兵力不超过 5 万人，包

括一个战略师团、一个铁路守备队 以及旅顺要塞司令部所辖的炮兵大队、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直接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 不足 15000 人。而驻扎在东北的中国军队，却有 18 个旅约 20 万人，另外还有各省的公安、警察部队。

当然，任何时候军队的战斗力都不只是由人数的多寡而决定。比起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因军事扩张主义煽动而士气高涨的日本军队，中国军队尤其是东北军的战斗力确实存在明显的差距。日本军方曾扬言，一个日军联队（相当于一个团的建制）的战斗力大致和中国一个师相当 即 1 对 8。所以日军在兵力配备上，往往以这个比例来计算。从以后的日军侵华战事看，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情况还真是在这个比例上波动。况且，虽然就整个东北而言，日军兵力较少，但在出事的辽宁 中国军队却也只有 6 个旅约 5 万人 与日军相当。

尽管这样，日本人也不可能在“九一八”一个晚上就占领沈阳，占领北大营。说到底，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东北军部分领导人的“恐日病”帮了日本人的忙。

早在 1931 年年初，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就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具有在严寒天气及山地条件作战经验的多门师团调到了东北 驻扎在旅顺、沈阳、铁岭、海城一带。多门师团一在辽东登陆，就进行了攻城演习。驻扎在沈阳附近的日军独立守备队，则装备起了两门 24 厘米口径的攻城重炮，这两门炮就由后来占领北大营的川岛大队使用。曾经做过张作霖军事顾问、素有“中国通”之称的本庄繁中将出任了关东军司令官 另一“中国通”原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也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与此同时，日本特务及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侨民、浪人也大肆活动 他们收集情报 散布谣言 制造事端 挑起矛盾。一种莫可

名状的恐怖气氛一直笼罩着沈阳，笼罩着东北，人们惶恐不安。

面对日本人的磨刀霍霍，中国东北军的将领们也预感到大战日渐迫近。

这年 8 月初，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召集了团级以上的军官，讨论形势和对策。七旅负有保卫沈阳的责任，一旦战争发生，第一发炮弹准落在他们头上。军官们一致认为，日军近期必有动作，应该作好应变准备。王以哲根据众人的意见，整理出了一份日军在东北活动的详细资料，亲赴北平，向张学良面陈。

张学良静静地听着王以哲的汇报，没有插话。其实，很多情况他早已得到密报。等王以哲汇报结束，张学良才告以实情，东北的局势，他已电告南京政府。南京蒋介石有指示：“与日本人打交道，一切先从外交上考虑。军事上要避免冲突，遇事要退让，不得发生争执，不得给日本人提供借口。”

王以哲早就听说南京方面对日本人的妥协态度，果然如此。他盯着正在协和医院治病、满脸病态的张学良问：“那么少帅的意见怎样？”张学良面无表情，木然地答道：“蒋主席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你回去传达吧！”王以哲脑子“嗡”地一下，满腔热血顿时凝成了寒冰。将领们将少帅视为主心骨，盼着他给个万全之策，没想到少帅竟然没有自己的主见。

王以哲悻悻地回到沈阳，向部属传达了少帅其实是南京蒋介石的指示。旅参谋长赵镇藩首先表示不满。他问王以哲：“日军如果只是闹闹磨擦，那倒好办，但如果对我军发动攻击，该怎么办？”王以哲看了看赵镇藩，又看了看在场的军官们，有气无力地说出了三个字：“不抵抗”。军官们沉不住气了，有几位便站了起来。赵镇藩摆了摆手，让众人静下来，继续问道：“如果不抵抗，岂不是束手待毙？”王以哲叹了口气说：“这是中央给少帅的死刑，有什么办法，我们是军人，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使少帅为难。”

人们哑然了。

再说张学良，虽然打发走了王以哲，但对东北的时局也是忧心忡忡。自从东北易帜、归属中央之后，他算是轻松了许多。虽然不能像父亲那样继续做“东北王”，但东北的大小事情还是他说了算。父亲留下的 30 多万军队，也仍是由他统率。他张学良不仅有功于国家的统一，对于日夜觊觎东北的日本人，也不必独自对抗了。既然东北统一于中央，那么在对日问题上只需听命于中央就行了。是和是打是走，自有蒋介石拿主意。

但近些时间以来，张学良有些坐卧不安。日本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从来就是不择手段。从父亲皇姑屯被炸，张学良就深深感到日本人是一伙背信弃义、阴险歹毒的强盗。他不顾内部某些高层人士的反对，毅然决定东北易帜，很大程度就是为了使对付日本成为全中国的事情。他认为，光靠东北军，光靠东北一隅之地，是无法与日本人抗衡的。但蒋介石却一直把共产党和红军视为心腹之患，对于日本人，则一再要求张学良忍耐克制。万一日本人端着刺刀、架起机枪杀了过来，那该怎么办？看看东北的局势，大概这一天就要来到了。

张学良坐不住了，他给南京发了急电。这时的蒋介石正坐镇南昌，在德、日、英等国顾问的帮助下，指挥 30 万大军对赣南、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收到南京转来的张学良急电，蒋介石一板一眼毫不含糊地发了一个回电：“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均应予不抵抗。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存亡于不顾。”至于如何实施“不抵抗”以及不抵抗而带来的后果，蒋介石一概不管，你张学良看着办吧！

蒋介石的电令由张学良转给了在沈阳的代理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和参谋长荣臻。

张作相是张作霖拉杆子做土匪时的生死之交，他效忠的只

是张家父子，蒋介石对他来说形同路人。他将南京电令搁在一边，让警务长黄显声立即去北平，转达他的请求：“一旦日本人动用武力，我东北军将士应为正义而战！”

张学良对这位父亲的把兄弟素来敬重，也知道他在军中的份量。对王以哲，张学良只是告诉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张作相，他不得不说明真情。蒋介石警告过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中国若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日本人不过是肘腋之患，共产党却是心腹之祸。

黄显声一行回到沈阳，将蒋介石当然也是张学良的意思告诉张作相。张作相直接感受到日本人的威胁。黄显声的话还没说完，张作相便挂通了给张学良的长途电话。劈头就问：“日本人进攻在即，多则一个月，少则十来天，他们的炮弹就要落到我的头上，难道我就在这里等着挨炮吗？”

听筒里传来的是张学良无可奈何的声音：“抗日是国家大事，要服从中央的命令。中央不让打，东北就不能单独行动。”

张作相火了：“蒋介石凭什么不让打？现在中国不是有 200 万军队吗？日本再厉害，眼下兵力也不过 20 多万。小日本欺软怕硬，狠狠和它干，说不定它就缩回去了。”

张学良还是那句话：“抗日要全国一致行动，光靠东北是不行的。中央说打，我们才能打。”

张作相追着不放：“那日本人打上来怎么办？”

张学良的回答仍然是：“没有中央的命令，日本打上来也不能还手。”

话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说？张作相摇摇头，搁下了电话。不过，日本人的炮弹最后并没有落到他头上。和张学良通话的几天之后，老太爷的死讯将他召去了锦州。

日本人要在东北动手，蒋介石其实比谁都清楚。9月12日，即九一八事变的前六天，蒋介石乘专列到达石家庄。在石家庄车站，蒋介石召见了张学良。目的只有一个，让张学良严令东北军，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蒋介石警告道：不要说东北军，就是全国军队开到东北，也打不过日本人。而且，眼下的主要敌人不是日军而是红军，一旦对日作战，便要腹背受敌。只有先“剿灭”共产党，然后再积蓄力量，才能对付日本人。不过，蒋介石也给张学良一副镇定剂，那就是国际联盟会对日本进行制裁。

国际联盟又叫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中国和日本都是这一组织的成员国。国联的口号是“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它设有国际法庭，名义上是调解和处理国际争端，实际上却是英、法、日等列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分割殖民地的工具。

以蒋介石的世故和历练，对国联的份量和底细应该是有所了解的。而初出茅庐、对国际事务懵懵懂懂的张学良却信以为真。既然日本人进攻有国联制裁，中央又不让东北军抵抗，那正好可以推卸责任，省得以东北军之卵去撞日本关东军之石。

张学良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东北军的部分高级将领本来就存在着畏日情绪和指望中央抗日的念头，既然蒋介石和张少帅反复强调不抵抗，也乐得不去和日本人拼命，军心自然更加涣散。待到日本人真的动了手，想抵抗也晚了。何况上面的命令，仍然是决不抵抗。

9月18日午夜，日本人冲进北大营，枪声杀声响成一片。在营中主持营务的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急得六神无主。他抓起电话，接通了沈阳城内总部参谋长荣臻的家。

电话里传来的是荣臻急促而肯定的命令：“不准抵抗，就是日本人进了营房，也不许抵抗，不准开枪还击！谁惹起事端，谁负

责任！”

赵镇藩声嘶力竭地解释：“日本人见人就杀，已经把刀架在脖子上了，怎么还不能还手？”

荣臻仍然是重复地说：“不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去，大家挺着死，为国成仁，为国牺牲！”

赵镇藩还想争辩，电话已被挂断了。第七旅在日军的驱赶追杀下，狼奔豕突，溃不成军。

荣臻也感到事态的严重，赶忙挂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正在看戏的张学良闻报是沈阳长途，急忙赶回协和医院。几个月来，他一直住在医院治病。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听完荣臻的诉说，张学良直愣愣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挂通了南京的长途。但蒋介石仍在江西“剿共”。国民党政府参军熊斌在请示了蒋介石后告诉张学良：“蒋主席有令，张司令长官务必严格遵守不抵抗命令，万勿刺激日本人。国民政府即刻将东北事态呈诉国联，望听候国联处理。”

真是荒唐透顶！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人自己不抵抗，却指望国际社会来帮忙。

张学良只有继续等待。9月19日，他等到了沈阳失陷、长春告急的消息；接着，又等到了蒋介石的最新指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望着这一纸电令，张学良颓丧地摇了摇头。

从9月18日深夜到19日，沈阳、长春两大城市失陷，公私损失200亿元。仅仅一个沈阳兵工厂，落在日本人手中的就有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及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多万发、炮弹10万发，占全国空军半数的300架飞机也全部停在机场，被日军掠去。这些，日后又都成了屠杀中国人的武器。

国土沦丧，军民牺牲，军械物资被掠夺，蒋介石的原则仍然

不变：日本人要沈阳我给你沈阳，要东北我给你东北，终不成你要了我的北平和南京！只要不到这一步，即使到这一步老蒋也决心先收拾掉共产党。

抱着这个宗旨 蒋介石从江西赶回南京后 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会后发布了一个《告全国同胞书》，一面将 9 月 18 日定为中国国耻日，一面却要全国民众埋头工作 交纳捐税 服从中央 保持镇静 绝口不提“抗日”二字。他的既定方针，是全力对付南方的红军。

二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日本人对沈阳、对长春并继续对整个东北的占领 以及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国高潮。

1931 年 9 月 20 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9 月 22 日 也就是国民党政府发布《告全国同胞书》 要求人民埋头工作、不问国事的同一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卖国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号召全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投入到反侵略斗争之中去。

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反映了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的共同要求并成为他们的实际行动。

面对 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和枪炮，广大的东北民众没有被吓倒，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日军占领沈阳后，沈阳各工厂尤其是兵工厂的工人停工、罢工，拒绝恢复生产。抚顺、本溪、鞍山等地的矿业工人 辽阳的纺织工人 安东的丝织工人 也纷纷举行罢工。辽宁、吉林两省的铁路工人则千方百计转移机车

车辆、破坏铁路、颠覆军车 阻止和破坏日军的侵略行径。未及退入关内的东北军余部及各地民间武装，迅速组织成为总数达数十万人的抗日义勇军，用简陋乃至原始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日本关东军进行殊死搏斗。

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各界著名人士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等人 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事抗日宣传、策应东北抗日义勇军。流亡到内地的东北学生，也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他们向内地民众控诉日本军队在东北的暴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

上海沸腾了。1931 年 9 月 24 日，35000 名码头工人首先宣告罢工，拒运日货。接着 邮电、水电、卷烟、针织、棉纺、皮革、铁路各业 80 万工人组成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号召抵制日货，退出日资工厂。商界代表作出决议，对日经济绝交，不卖日货。具有全国影响的《申报》、《大公报》等，连续发表评论和报道 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国闻周报》则以讥讽的笔调呼吁国民党政府：“以对外的‘镇静’功夫来对内 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揭露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卖国、对内专制独裁的面目。

全国各城市沸腾了。北平的邮电工人、天津的自来水工人、广州的纱厂工人 以及青岛、汉口、杭州、太原等地的工人及工商业者 纷纷举行罢工、罢市 组织抗日救国会 征募爱国捐款 禁止销售日货。

“九一八”的枪炮声 打破了各地校园的宁静。北平、上海、南京、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福州、南昌、武汉等城市的大中学校 学生们冲出校门 走上街头 举行集会游行 反对日本侵占沈阳、侵占东北，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政策。学生们身无分文，手无寸铁，有的只是一腔热血。日本人

的暴行使他们愤怒，国家的衰弱使他们痛心，国民党的退让使他们愤慨。

北平学生自发地汇集在一起，包围了张学良的住处。日本人用刺刀、用机枪杀害我们的同胞，你为什么下令不抵抗？

张学良当初天真地一心一意服从中央、侥幸地指望国联阻止日本人的侵略。为了不使日本人有挑起战端的借口，为了使国联在谴责日本时更理直气壮，当然，也为了避免他的东北军单独承受日本关东军的打击，张学良遵照南京的指示，命令部队不抵抗。没想到日本人的胃口如此之大，不但占了北大营、占了沈阳城，还占了辽宁、吉林两省，并向黑龙江进兵。他张学良真正成了民族的罪人。

望着黑压压一片血气方刚的学生，尤其是见到站在最前面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张学良不禁声泪俱下：“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爱中国，更爱东北，但我是军人，得服从中央。如果中央一声令下，我张学良第一个杀出关去，决不在他人之后。”

冤有头，债有主。既然是这样，那就到南京去，找老蒋去，政府凭什么下令不抵抗，凭什么将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

三 南京请愿

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组成了。随着列车南下，天津学生上来了，济南学生上来了，南下请愿团的队伍越来越大。

9月28日，南下请愿团还在途中，上海、南京的学生已捷足先登。他们冒雨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外交部，要求政府对东北事件作出解释，要求政府出兵东北。

请愿的学生在雨中站了老半天，中央党部和外交部却没有

一个管事的人出来回答学生们的的问题。一些学生忍不住了，他们冲进外交部，找到了藏匿不出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并将他拖了出来。

听说王正廷出来了，噪杂的人群顿时静了下来，他们要看看外交部长的态度。

王正廷来到外交部门前，立即有学生高声质问：“政府的那么多精锐部队为什么不用去打日本，却派去打红军？政府对日本一再退让，用意何在，请部长言明真相。”话音刚落，便有许多学生应声附和。

王正廷听着学生的问话，一声不吭。等到学生的声音再一次静了下来，他才开口。但谁也没想到他冷不丁甩出一连串责问：“国家大事，自有政府作主，领袖作主，你们这群娃娃懂得什么？国家现在需要镇静对外，你们这般胡闹，一旦刺激友邦，谁负责任？国家花钱让你们读书，你们却来南京闹事，是国家对不起你们，还是你们对不起国家？”

这些话本是蒋介石的发明，王正廷却用来训斥学生。学生们被激怒了，难道卖国有理、爱国反倒有罪？愤怒的学生捣毁了外交部的门窗桌椅，几个无处发泄怒气的学生揪住正想躲开的王正廷，痛打了一顿。

离开外交部，学生们来到国民政府所在地。这里早已是人头攒动，群情激昂。几个本地学生不知从何处弄来一口铜钟，悬挂在国民政府门前，轮流撞击。学生们扬言，蒋介石何时签署出兵命令，他们便何时停止撞钟。否则，便来个警钟长鸣，一直撞下去，决不离开政府大门一步。

随着阵阵钟声，学生的情绪继续高涨。

北平、天津学生南下请愿团到了，广州、长沙学生清愿团也到了。一直坚持在国民政府门前请愿的上海、南京学生欢呼雀